

姚海天

## 老将青史殊勋在——从《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谈起

1982年12月15日,是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颁奖的一天。父亲的《李自成》第二卷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东方》《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五部优秀长篇小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父亲和其他四位获奖作家登上主席台,领取了奖章、证书和3000元奖金。这笔奖金相当于父亲当时一年多的工资,但在会后他全部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对少年儿童事业表示一点心意。

光阴荏苒,不觉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至今已过去37个年头了。茅盾先生与父亲虽早已先后作古,《李自成》背后的故事特别是茅盾对《李自成》第一、二卷的重视、支持和评价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传播于一时,成为文坛佳话。而父亲与茅盾先生的彼此往来书信,已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

1973年父亲从湖北羊楼洞五七干校回到武汉,继续抓紧写作《李自成》第二卷,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尽量补回来。他在历史小说创作道路

仅看了“文革”前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和七八万字的《《李自成》全书内容梗概》,接着对70余万字的第二卷抄稿一气读了两遍,作了详细的笔记,然后进行一一分析和点评。第二卷书稿从《商洛壮歌》到《河洛风云》的10个单元,他逐一进行了详细点评,其书信写之工整、评点之深刻、文字之娟秀,学者说这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少有的。并且称赞:单从茅公和姚老的不论是毛笔字还是钢笔字看,这些书信本身就是令人赏心悦目、价值很高的书法作品。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两位文学大家学风之严肃,即使写信也一丝不苟,令人敬佩。

父亲对茅盾先生的这些书信极为重视,视为珍宝。1975年冬,父亲从武汉来北京之前,把茅盾的部分书信粘贴成册,在册页前面用毛笔手书《前言》。全文如下:

茅公已八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患黄斑盘病,一目一尺外不见五指,一目视力为〇.三——〇.四。承其将《李自成》第一卷看了一遍,并将第二卷抄稿七十万字读了两遍,写出比较详细的意见。这种关怀和热忱,使我十分感激。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涉猎中外作品极博,自五四运动以来经常分析别人的作品,故善于从小说的艺术特点评论小说作品,非同于一般评论家从干枯死板的条条框框出发。他的这些信件,有许多精辟入微,探出作者匠心。我通过写作实践,探索长篇小說的若干美学问题,而茅公在来信中所作的分析,常常与我的艺术追求恰相吻合,可谓独具“法眼”。今将他关于《李自成》的来信汇集成册,以便翻检。以后来信,另行汇编。茅公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史上有杰出贡献,而他谈论小说技巧的意见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相信他的这些书信必为后代所珍视。茅公不是研究晚明史的,对这些书信中所谈问题的局限性,不宜作过多要求。

姚雪垠  
七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现在,让我们摘取茅盾于1974年6月18日复信中关于《李自成》一单元《商洛壮歌》的两小段为例,以窥见其评析之精辟和



姚雪垠与茅盾合影

行文之美:

关于《商洛壮歌》  
一、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滴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风管鸱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

……  
四、第一章大段对话很多,这些对话有的说明情况,有的回叙过去,文气因此松弛,读之有沉闷之感。建议:这些对话太长的应求文字精简,或者,有些带有回忆性质的,不如另行改为正面的回叙,文字也求精简。

……  
五、有些大段独白,也觉沉闷。建议:改为一问一答的短对白,使文字流畅活泼。

《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创作于“文革”之前,“文革”后期修改定稿,1977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时好评如潮,洛阳纸贵。为满足读者需要,全国不少省市从中青社租用纸型抓紧赶印,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少见的一本小说热销的情况。对此,茅盾先生撰文说,他上海的亲戚买不到《李自成》第二卷,托他在北京买,书寄去后家人排队争阅。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茅盾与父亲关于谈《李自成》创作的部分通信陆续发表在《光明日报》《文献》等多家报刊上,受到《李自成》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和好评。“文革”

结束不久,全国迎来了文艺的春天,这批书信的发表,对活跃文艺界氛围、激荡左的文艺思想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2005年,我把两位文学老人的往来书信汇编成《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茅盾先生是一位长篇小说的大师,中国现代伟大作家之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后青年作家的导师,培养、提携了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父亲从青年时代就受惠于茅盾先生。1938年父亲在武汉写的短篇《差半车麦秸》,因小说中运用中原大众口语刻画人物,叙述故事,反映一个落后农民参加抗日游击队后经过锻炼,觉悟提高,而成长为英勇杀敌的战士。朋友办的救亡刊物嫌其语言“太土”弃而不用,父亲转而投稿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不但很快刊载,而且茅盾亲自撰文评价,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顿时在文坛引起轰动,成为抗战文学的名篇。其后,父亲的报告文学《战地书简》、中篇小说《戎马恋》《牛全德与红萝卜》及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先后受到茅盾的关注、介绍和评论。茅盾称赞说:“作者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作家”,“我们对于作者抱有无穷的希望”。1977年茅盾先生又给父亲书写七律条幅,称父亲是“壮志豪情未易摧,文坛飞将又来回”。

对于茅盾先生五四以来在革命文学和文化运动上的卓越贡献,父亲在茅公81寿辰时赋诗祝贺:

笔阵驰驱六十载,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厚谊兼师友,晚岁飞鸿论古今。  
少作虚邀贤监赏,暮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

在“文革”中左的思潮严重干扰下,父亲在武汉难以正常写作,无奈之下于1975年10月19日上书毛泽东请求给予支持。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对《李自成》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 11月2日”。于是父亲来到北京。父亲到京后,曾几次去茅盾寓所看望师长,两人促膝畅谈《李自成》创作和文学艺术,父亲受益匪浅。1981年茅盾生病住院后,父亲两次前去探视,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分别时彼此依依不舍。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病房晤谈竟是他与茅公的永别。茅盾先生辞世后,父亲在撰文中发自内心的说:“茅盾是我的恩师和知音。”“呜呼,恩师溘逝,我心中永留遗憾!”

1981年茅盾先生临终嘱托,要用他一生的稿费积蓄对全国的优秀长篇小说进行奖励。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很快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李自成》第二卷有幸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父亲没有辜负恩师对《李自成》的关怀、支持和期许。茅盾先生若九泉有知,对他付出过心血的《李自成》第二卷的获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1982年3月27日茅盾辞世。从3月30日到4月11日,在短短的12天里,父亲接连撰写发表了《老将殊勋青史在》《读旧信追怀哲人》《一代大师安息吧!——悼念茅盾同志》3篇悼念文章。1991年和1996年,父亲又发表了《茅盾十年祭》《为纪念茅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作》。这些纪念文章,都是父亲在紧张创作《李自成》四、五卷的情况下满怀深情写出来的,寄托了他对亦师亦友和知音的哀思和追怀,从多方面高度评价了茅盾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卓越贡献。

1997年2月父亲倏然病倒,但有一个愿望仍挂记在他心上,就是《李自成》四、五两卷出版后,有了一笔较多的稿费收入,要像茅盾先生一样捐出来,设立一个“长篇历史小说奖”,为推动我国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尽绵薄之力。1999年11月父亲去世半年后,《李自成》第四、五卷出版,我即遵照父亲的心愿和嘱咐,代表家人捐出其版税50万元,中国作家协会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迄今它已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文学奖项之一,先后有8部优秀长篇历史小说获奖。

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是姚雪垠率先使用中原地区精练而生动的日常口语,写出了艺术和思想都较有水平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遂使充斥着“知识分子腔”的文坛为之一震。为维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而继续反对欧化倾向,为坚持文学大众化道路而反对乱造乱用新词汇的知识分子语风文风,姚雪垠又为自己提出来文学语言的“三顺(读着顺口听着顺耳看着顺眼)原则”,不着痕迹地从中国古典优秀文学中吸取营养,以增加个人作品中写景和抒情部分的节奏美、形象美、意境美。这种特色,贯穿于1930年代以后他的全部作品中。

到写《李自成》的时候,他在“三顺原则”上又加一条原则:为保持人物语言的历史感,人物对话中绝对避免现代词语出现。除此之外,写三教九流的下层社会时,为保持人物语言的身份感和地域感,特定场合中可以使用“流寇”黑话和地方土话以及“行话”“帮话”;写皇帝、大臣、士大夫等中上层社会时,则在他们的习惯语言中适当加进文言成分和通用典故,以符合其阶级、阶层和身份的语言习俗。对这一点,茅盾先生看得明白:“此书人物的对话,或文或白,或文白参半,您就是就具体事物、具体人物,仔细下笔的;这不光做到合情合理,多样化,而且加浓了其时其事的氛围气,比之死板板非用口语到底者,实在好得多”。

不仅如此。为反映古代知识界人士人人都会作诗填词的历史真实,姚雪垠又将古典诗词作为特定人物的“特殊语言”,成功地使用于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上。

《李自成》1—5卷中,姚雪垠为皇帝及其文武将乃至县邑小吏等院长老,为义军首领及其将士乃至将士亲属等各类人物代拟诗词近50首,其中诗有绝有律有古风有骈体;词有《西江月》有《沁园春》有《贺新郎》有《满江红》;另有题赠、集句、对联、灯谜、诏谕、偈言等20多种。此外还代李岩写了致闯王长信一通,代崇祯写了祭洪承畴文一篇。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一首签诗:“春回大地草芊芊,又见笙歌入画船。关塞天寒劳戌旅,江山日暖闹烽烟。玉楼辜负十年梦,宝镜空分孤影妍。莫怨深宫音问少,一声清唳雁飞还。”茅公看后感觉甚好,说签诗就必须这样模棱两可,才能任凭人随意解释。而这支签诗是田广为崇祯抽的,签诗就得更含含糊糊。不光说吉说祥话,崇祯会不信;只说晦气话,崇祯会发怒。茅公问这么好的签诗见于何处,姚雪垠幽默地指着自己的肚腹,而后二人一起开怀大笑。如此这般,这些形式不一风格各异的诗词对联,已成为建构典型环境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活泼灵动丰富多彩的一种“特殊语言”,实为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所仅见。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家研究

许建辉

自1981年开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已评出几十部获奖作品。其中有幸为茅盾先生亲自读过并以万余字逐单元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者,似乎只有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是姚雪垠70年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从下笔开始,作者就立志把它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性多卷长篇。1974年曾将全书题要抄奉茅公,茅公欣然回复:“来函谓全书有五卷之多,逾百方言,想见笔锋所及,将不仅为闯王作传,抑且为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绘一长卷,作一总结。如此规模,不愧鲁殿灵光。”

从1957年到1997年,姚雪垠用40年心血打造了一部《李自成》。超级慢动作,很难见容于当今的快节奏,而姚雪垠却任凭青眼白眼,他从来都只管昂首走自己的路。当年,他对丁玲讲:批判你的“一本书主义”,我就很不通。你的“主义”挺好哇!如果作家们都照你的“主义”办,每个人都精雕细刻出“一本”传世经典来,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该有多伟大!

《李自成》能否“传世”,有待历史作答。但姚雪垠一心想把它写成“经典”,则简直是一定的。姚雪垠是个颇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人,年轻时曾题铭抒怀“不做历史的旁观者,要做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70年文坛跋涉后应该算是大梦成真——一部《李自成》,让他从理论探索 and 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皆有所获:

第一,他关于“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之命题,为当代历史小说提出了新的创作原则,由此而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第二,他重新提出了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如何为现代生活服务的问题,反对随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反对“借古喻今”;主张历史小说要通过艺术形象、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各种经验教训和成败规律来启发、教育、感染读者,要教给读者许多从历史著作中学不到的知识,要给读者提供丰富的艺术享受。第三,他创建了一套与百科全书式巨著相适应的长篇小说结构美学,以及与之配套的以“笔墨变化丰富多彩”为核心的创作方法。第四,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历史,获得了对李自成和崇祯的深刻认识,从而塑造出了两个具有首创意义的悲剧人物形象。第五,他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优秀传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完成了小说美学上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之历史任务。

囿于篇幅,这里只谈最后一个问题,

即《李自成》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

姚雪垠关注小说美学上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先后经过了“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两场讨论,我国的长篇小说逐渐改变了只重视向西洋学习的欧化倾向,开始朝着民族化方向发展。姚雪垠赞成“民族化”,但他不用“民族形式”而用“中国气派”来表示他的追求。因为他认定发掘扬弃祖国古典文学遗产是文学民族化的必由之路,所以他从那时起就启动了从《三国》《水浒》《金瓶梅》到《歧路灯》和《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等等古典名著的美学研究。

1975年4月,姚雪垠写过《无题》组诗6首,可视为他对部分古典名著的研究成果之一。以“其二”的中间两联为例:“低回红楼辞水寨,怅望青枫吊汨罗。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张口就明确表态喜欢《红楼梦》不喜欢《水浒传》,继之先屈原再夸杜甫,然后又贬斥施耐庵。为什么呢?因为《红楼梦》会写日常生活,而《水浒传》这一点不行。《三国演义》也一样,用组诗“其五”的说法就是:“故事传奇写入胜,风光生活画不成”,归根结底,是“贯中尚欠丹青妙”,不能“笔墨随心绘世情”啊!所以,姚雪垠“织锦私师屈子意,写生暗察雪芹灵”。他说过,“我青年时喜读屈原作品。《离骚》五百句,丰富多彩,对我写《李自成》颇有启发。”又讲:“就中国古典文学说,《红楼梦》、屈原和杜甫的诗,给我较多的艺术启发。”“‘西山爽气透胸襟,雨过芹溪沃我心。’这两句诗可说明我受到《红楼梦》很深的艺术熏陶。”

在姚雪垠看来,《红楼梦》是我国第一部将塑造人物看作小说创作根本目的长篇小说作品。动笔之前,曹雪芹胸中先活跃起来有性格有血肉栩栩如生的—群人,然后才为好写她们而编织出许多故事情节。这样的创作方法可以保证既定计划不会在创作过程中发生大的变化。正是因为学习了曹雪芹的这种创作方法,先让一群人人物在书中活起来,姚雪垠后来才敢也才能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

姚雪垠学习《红楼梦》的第二个收获,就是描写日常生活,用一丝不苟的工笔,细致地、准确地绘制出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民族生活风情画,星罗棋布于整部《李

自成》之中。大者有北京灯市、河南婚礼、相国寺风光、洪承畴公祭、长安贺节、盛京“百戏”;中者有术士的占卦占卜,骚人的诗酒雅集,巫婆的装神弄鬼,闯王的漯河观操;小者有谷雨日贴在墙上的一道“压蝎符”,开封馆子里的一鱼数吃……除此之外,还有紫禁城里的活动:临朝、议事、抽签、下棋、“省愆”、祈禳等等。这些风俗画不论大小,各个以其浓重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味,渲染了时代气氛,再现了典型历史环境,为物性格提供了发展平台,让读者能在《李自成》这帧巨幅历史画卷的可触可感中实现穿越,乘梦飞回300多年前的历史时空中。

姚雪垠学习《红楼梦》的第三个收获,就是写人物,通过描写生活去不断加深和烘托人物的性格。《李自成》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有200多个,这里只说最大的两个——李自成和崇祯。

第一卷,李自成全军覆没。但他不动摇不妥协,而是用百折不挠的毅力奋发图强的精神绝地求生,将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第二卷,李自成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成长,政治上日臻成熟,事业上不断发展。第三卷,地位在变,人也在变。作为封建社会农民起义英雄的李自成,其与生俱来的弱点在逐渐暴露。他的事业正走向巅峰,而失败的种子也在明显地孕育中。第四卷,李自成亲率大军渡过黄河,一路斩关夺隘打进北京,很快就开始在胜利中沉沦,自身的局限及战略的失误都充分暴露。当他猛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才决定推迟登基,奔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在与吴三桂的第二次交锋中,被突然杀出的清兵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回北京后匆匆登极又匆匆撤离,退往陕西途中又连续败绩,潼关失守后放弃长安退往湖广,最后单人独骑死在九宫山麓。李自成的悲剧,在小说第三卷就已经开始。几十万人口的开封,百姓或在围城中饿死或在决堤后被黄水吞没,能侥幸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深爱着李霸的慧梅被强迫嫁降将袁时中,后来又帮助闯王杀死自己降而复叛的丈夫然后自尽。第四卷,君臣忙于劝进和演习登极大典礼仪。大顺军纪律败坏,城内不断发生抢掠案、强奸案。出兵山海关前夜,由李自成亲自赐婚的费珍娥在洞房中

## 从《李自成》看姚雪垠的文学贡献

刺杀了大顺军的干将罗虎。山海关之败,让李自成变得徧狹多疑,由猜忌而错杀李岩兄弟……

姚雪垠与人谈话:“正因为他确实很杰出,很了不起,拼命地斗争,影响很深远,然而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违反了客观规律,终于失败,这便是悲剧。”

崇祯也一样。自从登基,11年中清兵四次入塞,有三次直逼北京城下。国内农民造反此起彼伏,撼动葫芦起来嘛。他自谓“非亡国之君”,宵衣旰食,事必躬亲,可是他越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枉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一天天乱下去。清军进逼之初,崇祯曾考虑南逃,因遭大臣反对而未果。闯军兵临城下时,他仍有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快破灭,不得不逼死皇后砍死女儿,然后哭别皇城自缢煤山。

按照当时流行的“三突出”原则,李自成只能是一个“高大全”,只能写其长不能说其短,否则就是贬低了农民英雄。但姚雪垠死抱住他的“历史现实主义”不放,宁愿书不出版,也不肯把李自成写成反孔英雄,也要写出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写出他的局限性。同样是按照当时的“三突出”原则,作为头号反面人物的崇祯皇帝,三笔两笔画出一个脸谱即可。而姚雪垠偏偏工笔细描浓墨重彩地来写他,写他问计写他俯仰写他祭洪写他哭庙……茅盾先生说:“详细刻画宫廷生活并不等于突出反面材料,而是相反,正所以充分暴露明统治集团之深刻的内部矛盾及其极端的腐朽糜烂的生活。”“这一大段(指《杨嗣昌出京督师》单元)的宫廷生活不是闲文,写得相当深刻,而又波澜起伏。”“这个单元(指《紫禁城内外》)写崇祯之无能、多疑、自以为是,事事处处昏庸而自以为明察,无才无德而自以为智慧过人等等,将这个至死犹自称‘朕非亡国之君’的末代皇帝的形象进一步深化了。”“宫廷生活的细节描写有其必要:一以加强本单元之形象化;一以为封建皇朝的繁琐仪注、浩大开支、吸尽民脂民膏,存档备案。”“总之,我以为这个单元是写得很成功的。”

再说向屈原学习的成果,就是被《离骚》上天入地的浪漫打开了思路,从而创建了断岭横峰大开大阖的长篇小说结构美学和与之相配的“笔墨变化丰富多彩”

的创作方法。以全书最大的单元《商洛壮歌》为例,茅公评说:“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滴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风管鸱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开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之惊涛骇浪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最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梁,耐人寻味。”姚雪垠则自谓:“‘英雄痛洒山河泪,儿女悲吟离乱歌。方看惊涛奔急峡,忽随流水绕芳坡’。这就是我的美学主张。”

而《三国演义》对姚雪垠的启发则是反面的。“阵前苦斗貔貅将,旗下旁观草木兵。”姚雪垠先这样不无嘲讽地批评了罗贯中对战场厮杀的描写,继之大刀阔斧地颠覆了古典小说战争描写的传统套路。为此他先认真研读了戚继光的《练兵纪实》和《纪效新书》,在熟谙相关军事知识基础上虚构了一场火火相搏的“潼关南原大战”。那是一场让李自成全军覆没的战斗,其惨烈血腥任凭作家乘风破浪驰骋想象浓墨重彩挥洒才情,笔力所到诚如茅公所见所记:“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而两面有时亦复衔接。如此布局,极见匠心。”而且,那是一场古代的“人民战争”,作家笔下既有将领们的特写镜头,更有士兵们的集体群像,就连临时找来的驮背向导都把手中的柞木棍子当成杀敌武器挥舞得呼呼生风,名副其实的“枪林逼,枯木朽株齐努力”。茅公为之评说:《李自成》“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特点”。

如上所述,姚雪垠所追求的“民族化”,是包括了结构方式、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使用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目标。其中他下力气最大花时间最多的是在语言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语言,欧化倾向一度十分严重,因为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而被讥称为“新文言”,已经